

## 德国针对新兴大国的新战略

作者: Robert Kappel

2012年2月8日, 德国联邦政府颁布了与新兴大国合作的方针。外交部长Westerwelle认为, 新兴大国在经济领域颇为重要。同时, 他强调, 这些国家“在政治、文化方面, 亦早已成为新兴力量中心”。

### 解析

在欧洲及美国, 越来越多的人清楚地意识到, 中、印经济上紧追欧美, 不仅如此, 它们还与其他的地域大国开展合作。这两个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得到增强。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。德国必须重新调整自我, 重新定义自身的政治与经济角色。

- 过去数十年内, 中国、印度、巴西及其他的地区性新兴大国, 经济高速发展, 社会福利程度提高。它们成为世界经济的新支柱。
- 欧盟现身陷经济危机, 缺乏政治连贯性, 因此, 它益发沦为边缘角色, 而美国经济呈现颓势, 似乎将丧失其旧有的政治主导地位。
- “金砖五国”(巴西、俄罗斯、印度、中国及南非共和国)以及所谓的“新钻十一国”(“next 11”), 如土耳其、印度尼西亚、越南、哥伦比亚, 它们一方面经济活力强劲, 虽然它们仅为中等收入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; 另一方面, 它们开始结成新的联盟。在安全问题、世界贸易决策或气候政策以及发展政策这些国际事务上, 这些国家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。
- 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的火车头, 必须明确目标、主动应对, 切不可消极以待。德国联邦政府应深入研究同“金砖五国”、“新钻十一国”合作的机会, 并相应地同它们共同构建务实的新政策, 但是, 这一政策应不仅仅拘囿于经济利益。
- 而在欧洲范围内, 德国也必须重新定位。

关键词: “金砖五国”、“印度、巴西、南非对话论坛”(IBSA)、新兴大国、德国及欧洲政策

## 新兴大国挑战西方

中国、印度、巴西这类国家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行动力量。人们不能再将这些国家摒弃于全球新秩序对话之外。2012年，德国联邦政府出台了针对与新兴大国合作的《构建全球化——发展伙伴关系——分享责任》方针（参见：联邦外交部 2012）。

联邦政府对“具有创建力的新兴大国”（“new players”；德语：“Gestaltungsmächte”）作出如下定义：“它们是经济上的火车头，对本区域的合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，在世界其它区域也发挥影响。它们在国际决策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。在国际关系中，它们充满自信地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并日益承担起全球性问题中的责任。”（参见：联邦外交部 2012：2）。该方针表明，德国未来要自己参与到政治及经济重心演变的创建过程中来。

伴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，欧盟及美国明显陷入压力，要采取行动。这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压力。其原因是，多年来，中、印等国经济增长率显著高于欧洲、美国、日本及其他经合组织国家（参见：Kappel 2011a）。另一方面，这些新兴大国在国际及区域性论坛上的影响力也空前提高，因此，政治压力亦随之增大。这不仅体现在气候、能源、安全政策上，也表现在针对独裁政府的制裁问题方面，比如说针对叙利亚或伊朗政府采取的制裁活动。

实际上，充满自信心的新兴大国日益频繁地遵循自身的政治、经济方案，哪怕这些方案与现存强国的方案背道而驰。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。例如，2011年11月，美国总统Obama在亚太经合组织论坛（APEC）的上一次峰会上，向中国政府发出明确讯息：中国政府终应让人民币升值，以让美国经济得以喘息。同时，这一讯息也抛出一个诱饵：让我们共建太平洋新轴心。日本、韩国、澳大利亚、中国、美国能在这个新轴心里开展政治、经济合作。美国似乎竟然持如下看法：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未来，在太平洋新轴心得以创建，稍呈颓势的欧洲，却被摒弃在外。中国政府对此做出的反应，不仅是踌躇不决，甚至是反应冷淡。中国政府既不想让本国的货币升值，令经济追赶进程变得艰难，又不想过于贴近美国，让自身的国际活动空间受到限制。中国更青睐与多方结盟，包括与欧洲结盟。它遵循平衡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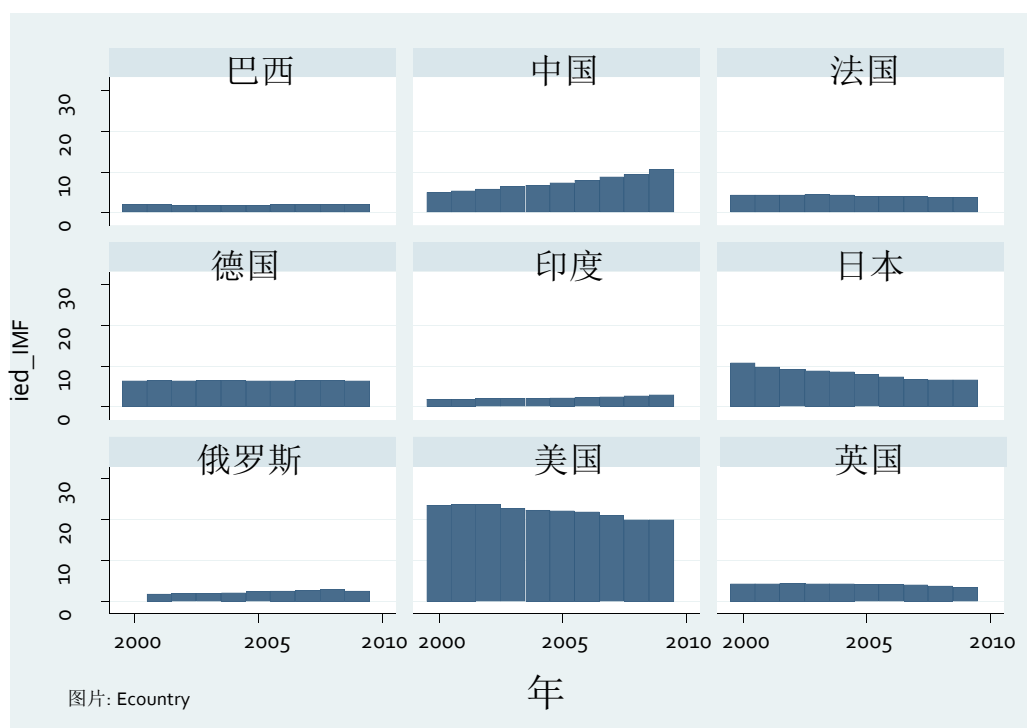
略，以求扩大其行动空间（参见：王缉思 2011）。中国知道，美国经济身处困境，片面确定同这样的美国合作，不利于中国经济追赶进程，会威胁经济发展成果。人们特别要考虑到，世界经济发展放慢，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就是：就业率降低、外汇储备减少。中国完全有意与欧洲开展合作，2012年2月1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峰会就表明了这一点。中国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合作伙伴。只有在中国也能从协议中获益的情况下（无论是同欧洲还是同美国签订协议），它才会行动起来。只有在确保投资无虞、并能增加中国影响力的情况下，中国才会加入到欧洲金融危机的救市保护伞中来。

## 新兴大国由旁观者转变为积极创建者

十年以前，在美国人和欧洲人的眼中，中国、印度还是世界政治的看客。现在，这两个国家已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。中国实施“走出去战略”，自信地参与到全球事务的创建中来（参见：Noesselt 2011）。西方相对地江河日下，新兴大国却势力增长，这种深刻变化标志着世界要过渡到一个新的秩序之中。Obama政府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行动，显示出他们已经察觉到了世界权力发生演变，而美国要奋起抵制。现在，美国公众激烈探讨本国的相对衰落，思考该如何让本国重返往日的大国地位。美国人的爱国情绪高涨，况且人们尚不能确信美国会丧失其世界主导地位，特别要考虑到它仍然是政治、经济上最具潜力的大国，即使它现在呈现颓势（参见：Nye 2011；Hippler 2012）。图一显示出经济主导地位的改变：德国基本保持不变，美国及欧盟所占的比例下降；与之相反，中国经济影响力极大增长，印度所占比例逐步上升。

近二十年来，几个新兴大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，最高能达到百分之十。技术上，它们突飞猛进，把握国际市场上的出口机遇，很快就由工业国家的世界工厂摇身一变，成为创新及技术中心。这些新兴大国之间也日益形成一股动力。它们组成政治、经济联盟，比如“金砖五国”、“印度、巴西、南非对话论坛”。

图一：经济主导地位衡量指数



图片来源： Kappel、 Pohl 2012；依照 Subramanian (2011) 的一个模式，进行演算，包括国民生产总值（占0.6比重）、贸易额（0.35）以及外部金融实力（0.05）。

即使这些国家现尚未能发展出共同的、行之有效的替代解决方案和机构，他们加大了彼此之间的协调。通过更紧密的贸易交流及共同的政治行动，它们结成网络（参见： Flandes 2010）。

新兴大国在行动上虽然有很大的区别，但是它们都首要谋求自己的战略利益，在各自所属的地区，大都遵循清晰的纲领。比如说，土耳其长时间在中东建立起领导地位，而欧盟诸国却对土耳其加入欧盟，并借此确保欧洲拥有通往阿拉伯世界的桥头堡这一问题上，表现得兴致索然。虽然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，可被视为是西方的同盟者，但它专注于同中国、印度、中亚、中东开展合作。土耳其从自身的高度经济活力中也获益匪浅。但是，由于土耳其追寻其国家主义、爱国主义目标，作为地域性的行动者，它在阿拉伯世界中只拥有有限的影响力（参见： Bank 2011）。而巴西不仅在气候、发展方面，也在贸易与安全问题上，想以全球行动者的身份找寻自己的战略。但是，巴西面临着巨大的经济、社会挑战，这限制了她的活动空间（参见： Kappel 2011b）。印度是个充满信心的世界政治行动力量，但现在，它还得把注意力放在本国问题上，而中国已跻身为经济、政治上最为重要的

创建者行列，并继续加强这一地位。中国的这种崛起是史无前例的，令国际社会既惊惧、又钦佩。中国充满吸引力，甚至为世界上许多的国家树立了榜样。

但是，具有重要意义的，不仅仅是新兴大国崛起及其崭新的自信心。它们是二十国峰会的成员，它们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（WTO）、世界银行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、联合国，在地区性联盟中，它们也占一席之地（如南方共同市场和东盟）。人们不能将它们视为一个单一的同类群体。正是中国、印度、巴西这些大国，首先谋求本国的利益，坚定代表本国的主权要求，它们并不代表“金砖五国”或“印度、巴西、南非对话论坛”这类新联盟的利益。在可预见的时间内，它们似乎只在特殊情况下，能在国际谈判中达成共同且具连贯性的立场。如果这些注重主权的国家彼此结成利益联盟，那也仅仅是为了反对西方的主导地位，比如说在安理会决策问题上或世贸谈判方面。<sup>1</sup>

<sup>1</sup> 但在这些新兴大国里，不存在着惯用的一体、一致的政策，诸多事例显示出这一点，如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主席职位人选问题（中国、巴西最终与美国、欧洲保持一致），针对叙利亚、利比亚、伊朗应采取何种政策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问题（中国阻止了巴西、印度的加入）。竞争行为阻碍着共同的行动，比如中国



这些国家之所以拥有改变世界力量格局的能力，不仅仅归结于其经济实力。<sup>2</sup>与传统工业国家不同，它们为其他国家提供富有吸引力的合作可能性。首先，它们一般会提供简单务实的解决方案。比如说，巴西、印度、南非共和国在生物技术、医疗卫生领域开展合作，共同研发产品，进行科研交流。无论是彼此之间开展交流，还是与更为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流，它们总能实现双赢。许多与经合组织国家一起开展的合作项目，耗费的前期及计划时间颇长，而新兴大国与之相反，大都很快速能实现双赢。它们同更为贫穷的国家开展合作时，会提供全部解决方案，从扶贫到农村发展、交换大学生到文化合作，它们都能提供。新兴大国能以务实的姿态，和形形色色的政治体系打交道，不干涉各国内政。<sup>3</sup>

这种处理方法将经济创造力与合作国家的网络建设，联系到了一起，这些网络关系能让它们更快取得成果。Joseph Nye (2010) 将经济实力、军事实力、文化、行动网络同旨在取得务实成果的具体措施连接起来的能力，称之为“巧实力” (smart power)，而新兴大国正常运用“巧实力”策略。它将经济高度增长与创新合作项目融为一体，这正是新兴大国的重要性突飞猛进的原因之所在。

## 错失良机？

对欧盟而言，关键的就是，面对新兴大国时，它能否成功地运用长远策略，能否成功地利用自身的高度经济实力和技术领先性，以及能否成功地发挥外交、文化、经济、科学、公民社会网络（参见：Jakobeit、Kappel、Mückenberger 2010）。过去数年，欧洲多次错失一致行动的机遇（参见：Maull 2012）。这不光表现在克服欧元危机方面，也体现在许多中心问题上，如2011年利比亚以及2003年伊拉克的军事干预问题，如何应

和印度的矛盾，或者巴西和中国的贸易纠纷（参见：Laidi 2011）。

2 印度、巴西、中国、越南、印度尼西亚、哥伦比亚等国，面临着众多经济、社会问题（社会不平等，部分极度贫困，基础设施问题）。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，都远远低于高度发达的经合组织国家水平，技术上也不占领先地位，等等，参见：Kappel 2011b。

3 德国的外交政策遵循价值导向，无法实现这一点；这样，德国的合作可能性受到限制，或者难度明显加大。

对俄罗斯对高加索地区、乌克兰表现出的野心，对中国该采取何种政策以及针对伊朗核计划方面，它现在都缺乏共同的政策。在期望及行动能力之间，横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。另外两个事例能显示出欧洲人缺乏创建的意愿和能力。第一个事例：2011年11月北京举行的欧洲货币会议 (Euromoney-Conference) 上，来自世界各地的举足轻重的银行经理济济一堂，就未来金融发展进行咨询。叨陪末席的又是谁？是欧盟及欧洲央行，它们疏忽大意，未曾派遣身份显赫的代表出席，以鼓舞人们对欧元以及欧元稳定方案充满信心。第二个例子：在非洲大陆上，中国、巴西、印度在基础设施及原材料供应领域，提供数目可观的国家及私人投资，以此为非洲提供新的增长前景。它们让欧洲及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看到，在非洲的投资，也可以带来盈利。这样，它们展现了一种新型合作模式。欧洲人应重新定义其利益，不再将非洲看成扶贫救助的接受对象。

欧洲必须意识到自己正相对衰落。从世界水平来看，欧洲不仅人口缩水，而且其贸易、投资、能源资源所占的比重，也相对减少，只不过欧洲的原起点水平颇高。但这并不是一场灾难。欧洲只应认识到，如果它不能成功地预见下面的发展，如果它不能重新调整应对，那么，为新兴大国的崛起所支付的代价会一路高涨。Eberhard Sandschneider (Sandschneider 2011) 在《欧洲成功的下坡路》中，用登山客的情形作比，只有攀登者做到了安全下山，那么他才成功地攻克了一座山峰。

下坡路也和未来的成功联系到了一起。但是，人们应该做到与时俱进，清楚知道自身有哪些优势。同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相比，德国都能更加轻松容易地实现这一点。德国政治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区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在许多经济领域，它是世界市场的执牛耳者，科技领先，创立了获得广泛认可的社会福利体系，拥有受过高度培训的劳动力，建立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、科研、文化网络。再者，德国享有崇高声望。这都是与新兴大国合作的出发点，它们不光要知道我们的弱点是什么，更要了解我们的经济优势与能力，认识我们的经济、文化、民间网络，找寻机遇，以实现深入合作、找到共同的学习及发展线路图。

与新兴大国寻找共同的学习、发展线路图的先决条件是，面对它们的崛起，既不恐慌，也不傲慢。如果中国企业未来加大在德国的投资，人们不应该感到恐惧，然而迄今为止，几乎未曾出现这类情形（参见：Kappel 2011b）。恰恰相反，中国企业让德国成为更加重要的经济地点，有助于两国实现投资平衡。而人们早就应该实现这一平衡。但是，中国企业来德国的目的，并不是为了拯救破产公司。

面对新兴大国时，表现得趾高气昂，也是毫无裨益的，比如说涉及到它们自身的价值观、技术发展问题。在许多领域，中国、印度、巴西以及南非共和国当然并非是一马当先，有时候它们表现得小题大做、反应过激。国际社会批评中国的环境政策以及在人权、反对派、批评性艺术家方面的粗犷作风，中国对此只是持有保留的容忍态度。中国参与国际解决方案时（比如叙利亚或伊朗的解决方案），表现出的能力是有限的。外界的批评常常令中国颇为光火。这儿总能一再观察到旧有的习惯反应，而人们应采取许多有针对性的共同活动来减少这类反应。欧盟在此可提醒他国注意欧盟的学习经验，与新兴大国对话中，欧盟可以自信地贡献这些学习经验。这里，关键之处仍在于，是否能成功地发展出一个与新兴大国打交道的策略，而这个策略应不仅仅聚焦于经济利益。这类政策的目标并不在于维护欧洲历史上所拥有的优势地位，而应是和新兴大国一起，致力于世界性的、有效的全球结构的继续发展。

新兴大国的追赶进程令人震惊，它们的政治影响力逐步增强，面对这一情形，现在德国与欧洲要注意不要让自己陷入不利境地。前文提到的Obama在亚太经合组织论坛协商上的例子，显示出至少美国不愿被迫落入被动防守的境地。美国或许已经明白，谁哪一次姗姗来迟了，他想再搭上车就不容易了。德国以及欧洲应该避免支付高昂的车费，现在应该迅速引入包含务实措施的新纲领。

## 德国参与国际政治的创建活动

德国政治界须采取行动。联邦政府的《构建全球化——发展伙伴关系——分享责任》方针（参见：联邦外交部 2012）指明了策略发展方向，这奠定了未来行动

的基石。联邦政府要开展合作的各方面，都得到了澄清。此外，联邦政府界定了其目标及行动措施。追寻的目标就是：和平与安全、人权与法制国家、经济与金融、资源、粮食与能源、劳动与社会，以及发展与可持续性。在这些领域，“联邦政府要促进建立在规则之上的全球多边秩序政策”（参见：联邦外交部 2012: 8）。

务实政策以及具体措施须予以精确阐明：

第一，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界一样，涉及到新兴大国政府各部如何进行国际调整、如何协调内部进程这些问题，德国政治界信息匮乏。人们很快就能发现，这些国家大都和德国一样，面临着类似的问题，常常力求找寻其他解决方案，但同时，它们也愿意借鉴西方的经验。

第二，面临的另一挑战就是：与新兴大国发展共同纲领。毫无疑问的是，在这些国家内部，德国要大力展现自己，只有这样，德国才能在全球环境下、在同第三方国家合作的过程中，达成共同立场，开展共同行动。上文分析的这些国家虽然取得巨大成功，但它们正处于巨大的变革进程中。在这一进程中，它们仍然需要国际参与及德国的经验，特别是涉及到全球争议性问题时，它们需要德国的经验。为这些国家的内部发展问题提供团结互助式的支持，能便于在国际进程中实现共同的定位。

第三，德国外交政策中，也应该写明三边合作的可能性。德国或欧洲与新兴大国以及第三方国家开展合作，这正是解决那些脆弱的国家的内部矛盾、推动持续性资源经营或者消除贫困的一个决定性杠杆。

尚需精确阐明的问题，还可以列出一长串。其中包括德国在外交、经济、科学领域的网络以及基金会、发展政治机构的网络的重要意义。在同新兴大国打交道、重新定位方向的这一阶段里，如何让这些网络更好地发挥价值，是德国未来政治的一项任务。

而在这一方面，德国是欧盟、特别是欧盟内部最为重要的力量。它决非从一个被动防守的境地出发的。现在许多美国的政治家、政治学家及经济学家放弃欧洲，这类做法彻底颠倒歪曲了这一大陆的经济、政治意义。在我们看来，从德国联邦政府的《构建全球化——发展伙伴关系——分享责任》纲领出发，下列领域就是实现富有成效的合作的出发点：



- “金砖五国”与“印度、巴西、南非对话论坛”虽然并不依据共同的建设性战略、开展行动，但他们日益加强相互协商，影响着地区及国际事务。这种相互之间结成的平面式网络变得更为强大。人们为共同的活动设立了更多的基金会，以进行“议程设置”（*Agenda-Setting*）。合作并不纯粹局限于经济方式合作，而应包括下列领域的计划：外交政策协调、军事合作、科学工作人员交流、吸引外国大学生、专家合作、外交官培训、文化合作的深化以及大力深化协调性的发展援助活动。特别是中国、印度、巴西这些大国在“全球治理”（*Global Governance*）中发挥力量时，融入了新的内容、形式、工具，让其政治、文化、经济影响扩展到全球层面及世界不同地区。它们如何投票表决，在各种论坛以及联合国层面、世界贸易组织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中，它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“追随者”，这些都显示出了“金砖五国”及“印度、巴西、南非对话论坛”的势力获得根本性的增长。了解这些发展、预测这些国家会采取什么新方法，这就是政治咨询的一项重要任务。
- 了解这些发展、预测这些国家会采取什么新方法，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世界体系的新发展。现在，二十国峰会能在许多问题上协调它们的行动。同时，世界正经历着区域主义及多边主义的发展趋势，这两种主义为自由贸易体系以及经济体系仅提供了“次优”的解决方案，而这尤其不符合德国（也包括欧洲在内）的利益。应对挑战、理解挑战，这才是未来更好地设计德国政策的根本之所在。<sup>4</sup>
- 越南、印度尼西亚、墨西哥、哥伦比亚、尼日利亚、马来西亚、土耳其和其他国家，构成了所谓的“新钻国家”，它们借着新兴大国的东风，顺利发展。这些国家经济高速发展，政治方针更为明确。和大国一样，与它们开展合作时，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，而要将合作扩展到其他的政治领域。在所有的

国家，政治基金会、发展组织、各种行业公会，当然还有数量众多的投资者都开展活动。“新钻十一国”的特别之处在于，它们正处于追赶与工业化进程之中，它们的（人口数目、面积）规模大小常常与德国相似。它们比“金砖四国”小得多，奉行超然于大国的独立政策。他们积极对待与类似大小国家的合作，是国际论坛（联合国系统、世界银行、世界货币基金组织、世界贸易组织）以及区域性合作（东盟、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、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、南方共同市场）中极其重要的活动者。

- 为了发展“软实力”，德国除了扩展其外交、发展政策、军事能力、商务网络以外，也要扩大其科研网络。通过科研网络，能建立长期关系，特别是如果这些网络能提供到德国培训的机会。在德国接受过培训的人，随着职业生涯的发展，有朝一日能身居要职，他们也会促进与德国未来的合作。拥有大量这类网络的国家，有更好的机会去影响未来发展的构建。再者，德国必须培养自己的外交政治精英，“他们具有应对全球新挑战所必需的能力”（参见：*Sandschneider 2012: 9*）。这样更有助于“巧实力”的形成，“巧实力”指的就是将经济、政治实力与“软实力”连接起来，令其转换成有效的策略，以保障自身利益的这种能力。
- 公民社会中的行动者，有力地影响着所有重要事务的创建，无论是未来的发展纲领、气候与环境问题，还是公平贸易协议的构建，抑或是工作标准、企业社会责任。许多国际协议确立时，国家甚至没有参与，人们开展咨询，以合约方式确定下这些国际协议（如商业标准、标准化）。但是，大多数国际协议是在世界各国以及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下缔结的。几个新兴工业民主国家（特别是巴西和南非共和国）将地区性以及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也纳入到其纲领制定及战略中来。

关键之处在于，德国联邦政府是否以及如何发挥前瞻性、应对新挑战，如何深化与中国、印度、巴西以及诸多“新钻十一国”的双边关系，同时关注涉及切身利益的最重要的问题（参见：*Kundnani 2011*）。目前，在“金砖四国”与“印度、巴西、南非对话论坛”里，许多只是滔滔雄辩：现实政策常常与官方声明大相径庭，

<sup>4</sup> 众多地区性合作联盟，令多边体系压力倍增。2011年11月的亚太经合会议清楚表明了这一点。美国期望，加强区域性合作及融合，能为自身的经济带来动力。亚太地区这一巨大的经济重心，不仅极大影响着地区性贸易交流、地区性直接投资、劳动力流动性，也对促进世贸组织继续发展、或抑制加强多边主义这类构想，都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。但是，这极大程度上取决于，中国是否准备加入到地区性阵营的构建中来。

有时对各自政府的影响力又估计过高。但中国与印度在各自国内举行的讨论显示出,在加强同美国、俄罗斯、欧洲的双边关系以及全球及区域战略方面,它们开展深入的工作。认识到这一点并深入探寻共同的纲领,是未来欧洲及德国政治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。

## 参考文献

Auswärtiges Amt 联邦外交部 (2012), *Globalisierung gestalten – Partnerschaften ausbauen – Verantwortung teilen. Konzept der Bundesregierung* (构建全球化——发展伙伴关系——分享责任。联邦政府纲领), Berlin: Auswärtiges Amt.

Bank, André (2011), *Die Türkei und die Arabische Revolte: Regionalpolitischer Auf- oder Abstieg?* (土耳其以及阿拉伯起义: 地缘政治的兴盛或衰落?), GIGA Focus Nahost, 9, online: <[www.giga-hamburg.de/giga-focus/nahost](http://www.giga-hamburg.de/giga-focus/nahost)>.

Flemes, Daniel (主编) (2010), *Regional Leadership in the Global System: Ideas, Interests and Strategies of Regional Powers* (全球体系中的区域主导: 地域大国的理念、利益及战略), Farnham: Ashgate.

Hippler, Jochen (2012), *Perspektiven der internationalen Politik im 21. Jahrhundert. Rahmenbedingungen deutscher Außenpolitik* (二十一世纪国际政策展望。德国外交政策的框架条件), in: *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*, 62, 10, 27-33.

Jakobeit, Cord, Robert Kappel, Ulrich Mückenberger (2010), *Zivilisierung der Weltordnung. Normbildung durch transnationale Netzwerke* (世界秩序的文明化。通过跨国网络构建准则), in: *Leviathan*, 3, 411-427.

Kappel, Robert (2011a), *Der Abstieg Europas und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– Verschiebungen in der Weltwirtschaft und Weltpolitik* (欧洲及美国的衰落——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的演变), GIGA Focus Global, 1, online: <[www.giga-hamburg.de/giga-focus/global](http://www.giga-hamburg.de/giga-focus/global)>.

Kappel, Robert (2011b), *The Challenge to Europe: Regional Powers and the Shifting of the Global Order* (欧洲的挑战: 地域大国与全球秩序的演变), in: *Intereconomics*, 5, 275-286.

Kappel, Robert, Birte Pohl (2012), *Economic Dominance* (经济主导地位), unveröffentlichtes Manuskript, Hamburg: GIGA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.

Kundnani, Hans (2011), *Germany as a geo-economic Power* (作为地缘经济强国的德国), in: *The Washington Quarterly*, 1, 31-45.

Laidi, Zaki (2011), *The BRICS Against the West?* (“金砖五国” 对峙西方?), CERI Strategy Papers, 11, Hors Série, Paris.

Mauß, Hanns W. (2012), *Außenpolitische Entscheidungsprozesse in Krisenzeiten* (危机时期外交政策决策过程), in: *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*, 62, 10, 34-40.

Noesselt, Nele (2011), *Strategiewechsel in der chinesischen Europapolitik: Umweg über Deutschland?* (中国的欧洲政策中的战略转变: 对德国绕道而行?), GIGA Focus Asien, 6, online: <[www.giga-hamburg.de/giga-focus/asien](http://www.giga-hamburg.de/giga-focus/asien)>.

Nye, Joseph S. (2010), *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* (美国国力的未来), in: *Foreign Affairs*, 89, 6, 2-12.

Sandschneider, Eberhard (2012), *Deutschland: Gestaltungsmacht in der Kontinuitätsfalle* (德国: 持续性陷阱中的新兴大国), in: *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*, 62, 10, 3-9.

Sandschneider, Eberhard (2011), *Der erfolgreiche Abstieg Europas* (欧洲成功的下坡路), München: Hanser.

Subramanian, Arvind (2011), *Eclipse.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's Economic Dominance* (日蚀: 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阴影下), Washington, D.C.: 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.

Wang, Jisi 王缉思 (2011), *China'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* (中国大战略求索), in: *Foreign Affairs*, 90, 2, 68-79.

## ■ 作者简介

Robert Kappel 教授、博士，2004至2011年担任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主任一职。现在，他研究由“金砖五国”带来的经济及政治力量演变。

邮件地址：<robert.kappel@giga-hamburg.de>，网址：<<http://staff.en.giga-hamburg.de/kappel>>

## ■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中，本专题的相关研究

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内，四号科研重点就“国际关系的权力、规范及管理”专题，研究地域性主导大国在地区及国际范围内的势力增长。“多极体系中的外交政策战略”科研小组，对比分析非洲、亚洲、拉丁美洲以及中东崛起的活动力量的外交政策。

## ■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中，本专题的相关出版物（摘选）

Bank, André (2011), *Die Türkei und die Arabische Revolte: Regionalpolitischer Auf- oder Abstieg?* (土耳其以及阿拉伯起义：地缘政治的兴盛或衰落？), GIGA Focus Nahost, 9, online: <[www.giga-hamburg.de/giga-focus/nahost](http://www.giga-hamburg.de/giga-focus/nahost)>.

Flemes, Daniel (主编) (2010), *Regional Leadership in the Global System: Ideas, Interests and Strategies of Regional Powers* (全球体系中的区域主导：地域大国的理念、利益及战略), Farnham: Ashgate.

Flemes, Daniel、Dirk Nabers、Detlef Nolte (主编) (2012), *Macht, Führung und Regionale Ordnung. Theorien und Forschungsperspektiven* (权力、领导与区域秩序。理论及研究前景), Baden-Baden: Nomos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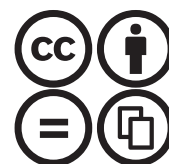
Flemes, Daniel、Sören Scholvin、Georg Strüver (2011), *Aufstieg der Netzwerkmächte* (网络性强国的崛起), GIGA Focus Global, 2, online: <[www.giga-hamburg.de/giga-focus/global](http://www.giga-hamburg.de/giga-focus/global)>.

Godehardt, Nadine (2011), *Chinas Ankunft in der Welt – Chinesische Außenpolitik zwischen Anspruch und Wirklichkeit* (中国抵临世界——要求与现实之间的中国外交政策), GIGA Focus Asien, 1, online: <[www.giga-hamburg.de/giga-focus/asien](http://www.giga-hamburg.de/giga-focus/asien)>.

Godehardt, Nadine、Dirk Nabers (主编) (2011), *Regional Powers and Regional Orders* (地域大国与区域秩序), London: Routledge.



GIGA《焦点》刊物，为开放式发表刊物。您可以在网上免费阅读、下载，链接为<[www.giga-hamburg.de/giga-focus](http://www.giga-hamburg.de/giga-focus)>，并可依据“知识共享许可协议”中“姓名标示—禁止改作3.0”<<http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nd/3.0/de/deed.en>>的规定，自由复制、传播、展示作品。特别注意：正确注明该文首次发表于GIGA《焦点》刊物，不得更改、删节。



GIGA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– Leibniz-Institut für Globale und Regionale Studien (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 – 莱布尼茨全球与区域研究所) 坐落于汉堡，是一家政治上独立的、非大学性的研究机构，就非洲、亚洲、拉丁美洲、中东、全球问题，出版《焦点》系列的各期月刊。编辑组讨论、甄选文章，文章的中、英文版发表于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《焦点》刊物国际版。该系列刊物由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编辑、出版，非德国外交部刊物。选取的主题、作者所持的观点，并不代表德国联邦政府的官方立场。保留错误、遗漏的可能性。GIGA及其作者，对内容正确性、完整性、或使用本刊物提供信息而造成的后果，不承担负责。不使用女性专有人称、职位表达方式的原因，仅是为了方便阅读。

编辑：Robert Kappel；杂志系列总负责：André Bank、Hanspeter Mattes

翻译：曹娟 (Cao Juan)；审校及排版：Christine Berg (山可婷)

联络：<[giga-focus@giga-hamburg.de](mailto:giga-focus@giga-hamburg.de)>；GIGA, Neuer Jungfernstieg 21, 20354 Hamburg, Germany 德国汉堡

出版说明

**GIGA Focus**  
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 
Leibniz-Institut für Globale und Regionale Studien